科技訊息

楊振寧獲弗蘭克林獎章

楊振寧是當代物理學大師,對其成就大家早已耳熟能詳。去年11月,他更獲歷史悠久的美國哲學學會頒贈弗蘭克林獎章(The Franklin Medal)。這獎章是1906年為紀念學會創辦人弗蘭克林誕生二百周年,由美國國會授權設計和製造,當年曾由總統代表贈送一枚金質獎章予法蘭西共和國,此外一共鑄造銅質獎章50枚,交予哲學學會頒發。所以,獲獎是極難得的殊榮。在授獎儀式中,楊教授被譽為「自愛因斯坦和狄拉克以來,風格最優越的二十世紀物理學家」,並且讚揚他與李政道共同發現宇稱性不守恆是「精彩的破舊工作」,而他之發現非阿貝爾規範場論則是「為三十年後才建立起來的新思想打下基礎」,「他對數學之美的品味,浸潤了每一篇作品」。

楊教授是本刊編委,自創刊號開始就為本 刊撰稿,並給予多方支持和鼓勵。我們對楊教 授獲獎深感欣幸,並謹致以衷心祝賀。

企圖解決温室效應的失敗嘗試

溫室效應大部分是由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所引致(見本欄專論文章),那麼是否有可能大量利用植物的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,從而解決這個根本的環境問題呢?這可以說是開採和應用碳素燃料(fossil fuel,即煤和油),從而造成溫室效應的「逆過程」。

幾年前,海洋生物學家馬田(J. Martin)提出,大洋中懸浮微植物(phyto-plankton)的生長限制,往往不是氮、磷化合物而是鐵質,所以只要在洋面散佈含鐵的溶劑,就能刺激浮游

微生物大量生長,以吸收大量二氧化碳,固定在其體質內。這些微生物死亡之後,二氧化碳也隨屍骸沉積海底,不會重返大氣——這是一個加速產生碳素燃料,一箭雙鵰的神奇辦法。事實上,在小規模的玻璃瓶實驗中,這構想已實現了。

因此,去年秋天杜克大學海洋實驗室的巴貝(R. Barber)到秘魯以西格拉柏哥斯群島(Galapagos Islands)以南500公里的太平洋,在一塊8公里見方的海面進行同樣實驗。實驗船在這範圍內來回梭巡,同時將大約半公噸硫化鐵溶液傾倒在海水裹。果然,當地海水含鐵量很快就上升100倍,同時懸浮微植物生長速度在最初3日加倍,而且溶解的二氧化碳也增加了。

可是,到第4日,懸浮植物的加速生長就停止,海水中的鐵含量也迅速回降到原來的低水平——顯然,人工增加的鐵質已經從溶液沉澱出來,成為微粒,然後與其他細微廢物膠結,沉入深海。事實上,洋流經過格拉柏哥斯群島的時候鐵質含量同樣上升,而懸浮植物也大量增加,但洋流一進入深海,鐵質就沉澱,不再能影響海面生態。海水鐵含量之低,有其自然原因。這個嘗試表明,大規模環境工程並不是輕易的事。

超高温超導體

在1986-88短短兩年間,由於氧化銅與鋼鋼等稀土金屬燒結成的超導陶瓷之發現,高溫超導體的臨界溫度Tc一下子增加了將近100度,從30K上升到127K,大大超過液氮的沸點,同時也為超導現象的實際應用帶來無限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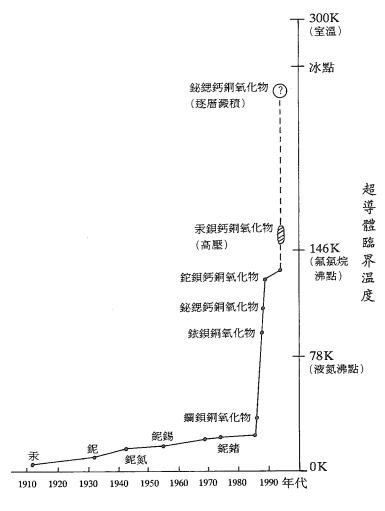
憬。可是,在隨後四、五年間,早期的興奮就慢慢冷卻下來了。因為,第一,再度提升Tc的努力並沒有繼續產生結果,直至去年上半年為止,Tc只不過到達133K而已。第二,在生產性能穩定的超導陶瓷,將之製成便於應用的可撓曲線卷,以及令其承受高電流密度載負等工作,都遭到了嚴重困難。要從研究到應用,高溫超導體似乎還有一段漫長的路。

然而,最近高溫超導又出現了新突破。首先,美國侯斯頓大學的朱經武和法國Grenoble國家科學實驗室(CNRS)的奈雷格羅(M. Nuñez-Regueirs)在去年下半年發現汞鋇鈣銅氧化物的合成陶瓷在3×10⁵大氣壓高壓下,Tc可以上升到164K,也就是高於常用冷凝劑氟利昂(freon)可以產生的溫度(約148K)。

去年底, CNRS的拉居(M. Laguës)所領導的小組發表報告, 說已製出Tc達到250K(也就是相當接近室溫的-23C)的多個超導薄膜樣本, 其電阻在250-280K的突然消失, 以及磁場之被排出導體外(邁斯納效應)都是典型的超導現象。而且, 樣本穩定, 超導性能可以維持多個星期①。

拉居小組的樣本是用精密的逐層「取向附生」(epitaxy)技術製成的:它基本是在鈦酸鍶單晶本底上,通過在線精密觀測和控制,把氧化銅逐層澱積上去,然後每八層氧化銅間以一層鉍鍶鈣銅化合物。這逐層澱積是極之緩慢困難的辦法,所以製成的薄膜只有300Å左右厚度。由於相鄰氧化銅層數多少與Tc有直接關係,層數越多,Tc也隨之上升。以前將有關金屬混合燒結的辦法可以利用熱力學平衡獲得兩、三層相鄰的氧化銅:高壓似乎也可以增加層數。但要達到三、四層以上的結構便似乎非用精密的澱積技術不可。過去數年間,已有許多實驗小組應用這一方法,拉居這一組可算是其中脱穎而出的了。

誠然,朱經武和拉居等的新超導物質是在 非常特殊的條件之下研製出來的,而且,拉居



的工作還有待證驗,但看來超導臨界溫度的再 次躍升和它的實際應用,可能已經不止是夢想 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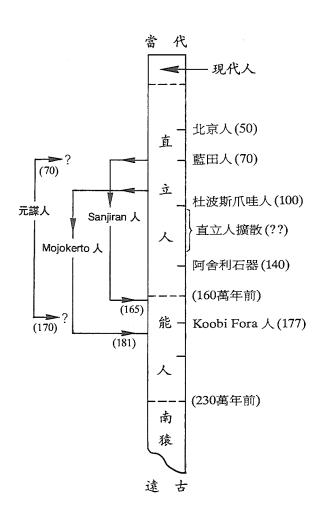
① Michel Laguës et al, Science **262**, 1850 (Dec 17, 1993).

人類起源之謎: 改寫直立人世系

最近美國加州巴克萊(Berkeley)「人類起源研究所」的寇蒂斯(G. Curtis)和他的前學生史衞殊(C. Swisher)利用最新發展的方法證明:本世紀在爪哇中部發現的古人類化石,年代並非向來估計的70-90萬年前,而是要推前到

165-181萬年前①。

這是一個關鍵性的大發現,因為它完全推翻自70年代以來的古人類學界正統觀念,即最原始的古代人(hominids)起源於東非(約250萬年前),其後在當地進化為「能人」(Homo habilis)(約230-160萬年前),然後再進化為「直立人」(Homo erectus)(約160-20萬年前)。所謂阿舍利型(Acheulean)手斧最早出現於140萬年前,它是直立人掌握高級石器工藝的標誌:這種石器出現之後,直立人才有足夠活動能力向非洲以外擴散。因此,在歐亞大陸上的直立人,最古的也只有100萬年左右歷史②。



古人類進化階段及相關化石年代示意圖,括號中數字以「萬年前」為單位。左邊所示即是兩個爪哇人化石年代的改變,以及元謀人年代的爭議。

例如,杜波斯(E. Dubois)發現的爪哇人是90-100萬年,30年代發掘的周口店北京人是50-70萬年,60年代在陝西發掘的藍田人是70-100萬年,年代上都符合前述正統觀念。只有70年代發掘的雲南元謀人一度被認為有170萬年,與正統觀念不符。但它資料極少,並非有力證據,因此後來又有將之修訂為70萬年前之說。

寇蒂斯等的發現是非常之驚人的,因為它 把1936年在中爪哇的毛約克圖村(Mojokerto) 和70年代末在桑基蘭村(Sanjiran)所發現的兩 種直立人頭骨化石分別推早到181±4和165±3 萬年前,那正是東非能人進化成直立人的年 代,不但遠早於阿舍利型石器年代,也早於東 非最早的Koobi Fora直立人(177萬年前)。因 此,亞洲直立人不可能是東非直立人的後裔 (這也解釋了何以阿舍利型石器從不曾在亞洲 出現):人類遠祖很可能在200萬年前已經擴散 到歐亞大陸,然後分別在各地獨立進化成直立 人。元謀人的原定年代(170萬年)也許畢竟是 正確的!

其實,寇蒂斯等並沒有發現新的古人類化石。他們的辦法是憑詳細記載和精密顯微技術,找到並確定原坑址,然後將坑址浮石中所含角閃石(hornblende)作為樣本,進行⁴⁰Ar/³⁹Ar成分比例分析。即是用激光逐次將微細樣本(質量在0.5毫克左右)加熱,令其逐漸釋出所含的氫⁴⁰Ar以及稀有同位素³⁹Ar,並用「在線」質譜儀測定二者比例,然後與已知年代的校準礦石樣本值比較,從而推斷絕對年代。這是四年前發展出來的精確岩石斷代法③,因此足以作為寇蒂斯驚人結論的堅強證據。

近十餘年來,嶄新的科學鑑證方法不斷衝擊古人類學,例如,最近有生物分子學證據顯示,全世界的現代人亦即所謂智人(Homo sapiens)都是由東非同一小聚落的共同先祖在大約12萬年之前向全球擴散而來,因此是和各地原有的直立人並不相干的。這說法所引起的

寇蒂斯的發現,卻與上述發現趨向相反:它把直立人變成多源的了。看來,人類先祖譜系還隱藏着許多意想不到的複雜性:甚至,古人類最早起源於東非,也未必就是定論——它總是可以被新發現推翻的。這說明,古人類學還處於描述性階段,它稀少和不完全的證據,還不能支持有固定結構的理論體系。

人口結構轉變的新模式

1974年布加勒斯特世界人口會議上有句名言:「(經濟)發展是最佳避孕藥」。二十年後今日,這觀念已證明錯誤:我們可能要倒過來說「避孕藥是最佳發展策略」了。

目前仍是世界上最窮、最落後的孟加拉是最好反證:在20年間,它的出生率下降了20%,從每名婦女7個孩子降到5.5個。理由不是經濟,而是避孕藥:適齡婦女使用避孕藥的比率在同一期間已從3%上升到40%。根據美國國際發展機構資助的大規模長期調查

顯示,其他拉美和亞洲貧窮國家也有明確的相同趨勢,即開發中國家人口出生率在近二十年迅速下降,速度遠過於歐洲在相同的人口結構變更期,但原因不是經濟發展,而是直接與避孕器藥的使用率相關。例如文化和社會結構都鼓勵高產的肯雅、津巴布韋和博斯溫那等三個非洲國家出生率在同期分別下降35%、18%和26%,而它們恰恰是薩哈拉沙漠以南國家中家庭計劃最發達的。

目前大多數工業國家避孕器藥使用率高達 70%,發展中國家則只有51%(連中國)。倘若 避孕需求可以完全滿足的話,這比例可以增加 到60%,而出生率則會(除中國)從2.3%/年 下降到1.6%/年,那麼下一世紀人口問題也 可得到紓解了。從人口角度看,社會工程不但 可能,而且還是有需要的。

- ① C. Swisher, G. Curtis et al, Science **263**, 1118 (Feb 1994).
- ②④ 對古人類起源問題的介紹見李逆熵〈尋找夏娃〉、《二十一世紀》19,85 (1993)。
- ③ A. Deino and R. Potts, J. Geophys **95**, 8453 (1990).

人物素描 袁鈞瑛教授

幾個月之前,人體控制個別細胞「循序死亡」(programmed death)過程的基因ICE(見後頁「專題報導」)發現了,作出這傑出貢獻的是哈佛大學醫學院的年青女研究員袁鈞瑛。

袁鈞瑛原籍上海,1977年中國初次恢復大學入學統考時,以全市第一名成績進入復旦大學生化專業,1982年再在全國生化生物留美考試中名列前茅,從而進入哈佛大學攻讀神經科學。她的論文由麻省理工學院荷維支教授指導,題目即是微線蟲 C. elegans 胚胎細胞在發育過程中循序死亡的研究。她1989年獲博士學位,自1990年開始在哈佛醫學院出任教職,目前任助理教授,並在著名的麻省全科醫院心肌研究中心領導一個八人研究小組,前述重要發現就是這小組的工作。袁教授經已成家,先生在同一領域工作,他們共有子女各一位。